



比较语言学丛书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潘悟云 主编

音韵论集

潘悟云 著

中西書局



比较语言学丛书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EISU

E-Institutes
of
Shanghai
Universities

潘悟云 主编

音韵论集

潘悟云 著

语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韵论集 / 潘悟云著. —上海: 中西书局,
2012. 8

(比较语言学丛书 / 潘悟云主编)

ISBN 978 - 7 - 5475 - 0406 - 2

I. ①音… II. ①潘… III. ①汉语-音韵学-文集
IV. ①H1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5800 号

音韵论集

潘悟云 主编

责任编辑 刘寅春

装帧设计 郑 艺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12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75 - 0406 - 2/H · 007

定 价 24.00 元

本书出版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
上海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S30402)和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资助

总 序

比较语言学,主要包括历史比较与类型比较。在中国的语言学界,这两者大体上还是各做各的,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

19 世纪出现的历史比较法,一直是历史语言学的主要方法,但是它有两个最致命的缺陷。

第一,它缺乏确定性。假如两个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 A 与 B,某个词在 A 语言中读 m-,在 B 语言中读 ph-,如果用它们来构拟其原始语的读音,通常的做法,是把它们拼合在一起作 * mph-,在 A 语言中 ph 失落,在 B 语言中 m 失落。实际上除此以外,还有第二种可能,可以假定其原始语是清的 m̥-,A 语言中 m̥-变化为无标记的 m-,B 语言中 m̥-变成 ph-,在许多语言中都可以看到音变 m̥->ph-。这种不确定性,给许多历史比较研究带上了主观性,这是科学研究的大忌,也是进入到 20 世纪以后历史比较语言学逐渐遭到冷落的原因。

第二,它缺乏解释性。上面的例子中,为什么可以把 m-与 ph-合成 mph-作为原始语的构拟,而不合成 phm-呢?也许可以这么解释,可以找到许多语言带 mph-声母,而很少有带 phm-的语言。但是为什么缺少带 phm-的语言,历史比较法无法作出解释。解释性,是现代科学的最基本要求。

20 世纪出现的新的类型学,研究语言的普遍现象,由此得到普遍规则,并探求其深层解释。各种语言中有哪些音的类型,哪些音

系的类型,哪些音的配合的类型,各种类型的出现频度,它们之间的蕴涵关系,等等。更重要的是,我们将研究音变链的类型,它们的深层解释,这就把语言的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真正地结合在一起。新的类型学为历史比较法消除了上面的两个缺陷,从而让它得到新生。

2006 年开始,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承担上海市教委的项目“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同时有全国各地许多高校与研究机构共同参与,成绩斐然。于是,我们特地出版这套“比较语言学丛书”,借此向国内外的语言学界奉上我们的贡献,展示我们的学术理念。

是为序,也代作出版前言。

潘悟云

2011 年元月于上海师范大学

自序

朋友说,不少人想看我早年的文章,却很难找到,建议结集出版。这本集子是即将出版的第一本,其中头两篇发表时我正在复旦攻读硕士,后八篇是在温州师院任教时候的文章。今天重读旧文,深感当年勇气可嘉,它们勾起了我很多怀想与感激。

1979年底,我在复旦上研究生半年有余,写了一封长信给王士元先生,向他请教词汇扩散的问题。不料王先生回信赞赏有加,并以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编辑部的名义,向我约稿评论他的 A note on tone development,于是我写了“关于汉语声调发展的几个问题”。王先生将此文分别寄给梅祖麟、桥本万太郎、陈渊泉诸位先生评审。从那以后,这些学术前辈,还有他们介绍我认识的包拟古、蒲立本、丁邦新、张琨等先生,给我很多关爱,引领我走向学术殿堂。

张世禄先生是我非常崇敬的语言学家。1978年研究生报考前,我曾冒昧给他寄去自己关于上古汉语复辅音的文章。后从余志鸿学兄处听闻,张先生竟然很看重我,不仅在学校招生会议上宣读我的信件,而且大力推荐,因此入学之初我们就成忘年之交。其时,张先生住在复旦教工宿舍,我常去他家中讨论音韵学。“轻重重浊释”就是硕二那年由先生推荐的。今天重读该文,张先生的慈祥音容,宛然在目。“等”是音韵学中最为混乱的概念,甚至影响了整个学科的进展。这篇文章对历史上各种“轻重”概念加以梳理,

指出韵图的轻重分为四个“等”，应是发音部位前后的划分，而非洪细之别。高本汉以后通过声韵配合关系所划分的“等”是介音的概念。“轻清重浊释”连同本集所收的“释二等”和之后的“反切行为与反切原则”，应是讨论古汉语“等”的重要文章。

1986—1987 年间，我曾两次应陈渊泉教授之邀，访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期间我们用短语音系理论研究温州话连读变调，这是我初次接触现代音系理论。归国后我运用这一理论写成“连调和信息量”一文。我在文中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如：零调(atonic tone)、词零调与句零调、附随式零调与低式零调，并且全面讨论了温州方言中的语音词(phonological word)、附着结构(clitic group)、语调短语(intonational phrase)，句法结构与韵律结构的关系，进而指出二者的接口为信息量。这是一篇有关声调的重要文章，可惜当时发表于《温州师院学报》，很少有人见到。借助这本集子，我把它重新奉献给语言学界。

温州师院任教十年间，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上古汉语和汉藏历史比较，但我更注重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创新。例如，我对谐声现象作了新解，指出谐声不只是一种语音现象，更是一种形态现象，试图将汉语上古音的构拟建立在更严密的谐声规则之上，同时希望以此为基础建立汉语历史形态学。我把王士元先生的词汇扩散理论与对抗性音变(competing change)概念引进到历史语言学，以期弥补经典历史比较法的不足，进而提出音变率的概念，用以揭示隐藏在不规则音变下面的潜语音条件。

此书收录的是本人 1993 年到上海师大以前有关语音演变的部分文章。由于各种原因，我与郑张尚芳先生那些年的论文无法

在《中国语文》、《方言》等杂志发表,所幸《温州师院学报》保留了这批早年成果。由于《温州师院学报》发行量不大,能见到文章的人不多,这些年来不断有人来函或者托人索要原文。感谢中西书局,给我这个机会把这些旧文从尘封中重新挖取出来,整理成集,赋予它们第二次青春。深深感谢《温州师院学报》,如果没有她,我与郑张尚芳的许多重要文章,根本无法面世。

潘悟云

2012年5月15日于上海师大

目 录

总序	1
自序	1
关于汉语声调发展的几个问题	1
“轻清、重浊”释	23
非喻四归定说	35
不规则音变的潜语音条件	55
词汇扩散理论评介	76
越南语中的上古汉语借词层	94
谐声现象的重新解释	109
上古汉语和古藏语元音系统的历史比较	127
连调和信息量	136
释二等	155

关于汉语声调发展的几个问题^①

——读王士元先生的 A Note on Tone Development

王士元先生从发音生理的角度考虑,认为中古本来就存在八个调形。随着汉语全浊声母的清化,调形比较接近的阴类调和阳类调就合并为一个调形了^②。所以汉语的调形不是朝着“分化”,而是朝着“合并”的方向发展的。这个“合并”的理论的提出,对传统的声调发展观念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它迫使我们的一系列问题作重新考虑,因而向汉语声调的历时研究在方法和内容上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汉语调形变化的趋势

汉语调形的合并趋势,可以从多方面得到证实。首先需要提到的当然是文献资料记录。《中原音韵》(AD 1324)有四个声调。日本沙门了尊《悉昙轮略图抄》(AD 1287)所记录的当时汉语有八个声调^③。更早一点,据日本沙门安然《悉昙藏》(AD 880)所记,承

① 本文承王士元、桥本万太郎、梅祖麟、陈渊泉诸先生赐阅,提出诸多宝贵的意见,指正多处,谨此表示谢忱。

② 本文阴类调和阳类调并提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指出,一般指传统四声的每一声中相对应的阴类调和阳类调。

③ 原文:“平声重初后俱低,平声轻初昂后低,上声重初低后昂,上声轻初后俱昂,去声重初低后偃,去声轻初昂后偃,入声重初后俱低,入声轻初后俱昂。”转引自周祖谟《问学集》,1966,北京。

和之末(公元九世纪)正法师和聪法师所传的中原一带汉语的四声已经各有轻重之分了^①。所以,从唐季的八个声调到《中原音韵》的四个声调,显然是经过了调形的合并过程。那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调形互相合并了呢?第一,阳上跟阳去因为调形比较接近,互相合并。第二,入声韵尾失落,出现了入派三声的现象。第三,全浊声母清化,使原来调形比较相近的阴类调和阳类调合并为一个调形了。

支持“合并”理论的最重要证据,可在方言材料中找到。就在现代的方言中,调形的合并还在进行之中。

1. 属于吴方言的丹阳话,声母失去清浊对立,声调文、白各异。文读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而白读在每一声中又各分阴、阳两类。其中,阳平、阳上、阴去虽然有相同的调值424,但是它们出现在连读前字却是明显不同的三个调形。可见比较古老的丹阳话白读应该有八个声调,后来阳平、阳上、阴去在浊声母的清化过程中因为调形的互相接近而合并了。我们知道,中国南部方言如果有文、白对立现象,一般说来,白读总是保存着比较古老的性质,所以,丹阳文读的四声调系统跟白读的八声调系统相比较,应该是比较后起的。也就是说,文读的四个声调是在浊声母的清化过程中,由八个声调合并而来的^②。

2. 河北滦县的阴平和阳平的单字调都是J11,但是当它们后接部分轻声字的时候,阴平字调值不变,阳平字的调值变为J21,比如“方家”是 faŋ tɕe J. 1,“房家”却是 faŋ tɕe J1. 1。在连读后字完全相同的情况下,这个变化当然不能再在后字中找原因。这里可

① 《悉曇藏》卷五(大正新修大藏卷八):“承和之末,正法师来,初习洛阳,中听太原,终学长安,声势大奇。四声之中,各有轻重。……元庆之初,聪法师来,久住长安,委搜进士,亦游南北,熟知风音,四声皆有轻重著力。”转引自 Mei Tsu-lin, 1970. *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 HJAS 30(1970).

② 吕叔湘,“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方言》1(1980)。

能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古滦县的平声只有一个调形,但是当它们出现在部分轻声字前面的时候,依照声母的清浊不同分化为两个调形;第二种解释,古滦县话的阴平、阳平是两个比较相似的调形,后来随着浊声母的清化,这两个调形合并了,而在部分二字组连读中,还残存着比较古老的形式。我是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解释的。下文将会提到,连读调形比起单字调来往往保存着比较古老的形式,这可以有許多材料作为证据。而且,连读调形的这种保守性质在滦县方言本身就可以得到证明。滦县的去声字包括中古的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五类字。其中,只有阳上和阳去两类字后接轻声的时候读作变调135,其余三类保持单字调755。阳上、阳去跟其他三类在古代显然具有不同的调形,现在读作一个调,只能是调形合并的结果。可见,连读中阳上、阳去跟其他三类字的区别,正是古老形式的遗留,而且这个现象正跟连读中阴平、阳平分类现象相平行^①。

3. 太原市南边的平遥方言跟滦县方言相仿,平声的单字调不分阴阳,但是在部分两字组连读中,阴平和阳平作为连读前字却是两个不同的调形。稍有不同的是,连读后字如果是去声字,会影响到前字的连读调值。这实际是同一个方言中古老形式和异化形式并存的现象^②。

4. 温岭方言阳平和阳上的单字调都是J31,但是在部分连读中却分作两个不同的调形,这也是连读字调保持比较古老形式的一个典型例子。温岭话的“桃花”≠“稻花”,“皮里”≠“被里”,这两对字组的后字全同,前字的现代单字音全同,它们中古的声、韵也全同,唯一不同的就是中古的声调。如果不认为古温

① 王辅世,“怎样分析和记录汉藏语系语言的声调”,《中国语文》6(1956)。

② 侯精一,“平遥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1980)。

岭话的阳平和阳上是不同的两个调形,我们就不能解释上面的这个现象^①。

5. 上海话在 J. Edkins《上海方言语法》(AD 1853)^②中还有八个声调,到赵元任先生的《现代吴语的研究》(AD 1928)就只有六个声调了,在目前上海新派的话中,阴上和阴去又完成了合并的过程,只剩下了五个声调。

从方言的材料来看,声调合并的类型大致上可分两种。第一种是传统四声的各个声调中相应的阴类调和阳类调的合并,如阴平和阳平的合并,阴去和阳去的合并等等。第二种是阴调类或阳调类内部各声之间的合并,如中古的浊上归去,上海方言的阴上跟阴去合并,阳平跟阳上、阳去合并,等等。下面,我们就把第一种叫作 A 型合并,第二种叫作 B 型合并。有的方言的声调系统可能兼有 A、B 两种的合并类型,如滦县的阴去、阳去、阳上的合并,可能是先经过阳上归阳去的过程,即 B 型合并,以后阳去跟阴去再合而为一,即 A 型的合并。

跟声调的合并类型相平行的现象,是方言中的声调异读类型,以及一些民族语的汉语老借词的声调例外类型。例如潮阳方言的声调文白异读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白读阳上,文读阴上;二是白读阳去,文读阳上;三是白读阳去,文读阴去^③。实际上,第一、第三两种就是跟 A 型合并有关的,第二种则跟 B 型有关。养蒿苗语的 1、2、3、4、5、6、7、8 各调分别与汉语老借词的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对应。但是也有例外情况,主要有两种。

① 李荣,“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1979)。以下温岭方言的材料均引自此文。

② J. Edkins.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1853. Shanghai. 转引自胡明扬“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中国语文》3(1978),下同。

③ 张盛裕,“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4(1979)。

第一种是同一声内部的阳类调和阴类调转换,即跟 A 型合并类似,如 ha¹“鞋”、hu¹“壶”是阳平入第 1 调, hai⁵“亥”、chu⁵“受”是阳去入第 5 调。第二种是阳类调或阴类调内部的转换,即跟 B 型合并类似,如 shaŋ⁵“伞”,阴上入第 5 调, pa⁶“抱”阳上入第 6 调,等等^①。

那么是不是还存在第三种类型的合并,比如阳平跟阴去的合并,阳去跟阴上的合并?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过哪一种还保存声母清浊对立的方言中有过这种合并类型。有些全浊声母已经清化了的方言中这种类型确实是有的,但是这种合并大多数发生在阳上跟阴去之间,而绝少阴上跟阳去合并的例子。这种情况可能也跟滦县方言一样,在浊声母发生清化以前已经发生了浊上归去的现象,以后随着清化的发生,这些原来是阳上的字就跟着阳去跟阴去一道合并了。由于看到的方言材料有限,当然还不能对合并的类型作出最后的结论,但是我们大致上可以认为, A、B 两型是汉语调形合并的主要形式。

那么,调形之间的互相合并到底有什么条件呢? 首要的条件当然是互相合并的两个调形之间要相当地接近,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而且也是有许多实际的材料作为证据的,如上海的阴上据赵元任先生记录是 3^b2^b ², 阴去是 2^b3 ^②, 两者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到现在的上海话中就合并为一个调了。但是除此以外, A、B 两型的合并还必须具备些什么条件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声调的含义。依照传统的看法,声调就是一个音节的基频曲线,属于超音段特征。但是在汉语中,这种说法是不完备的。比如吴语、闽语中的入声调,就应该包括韵尾这个音段特征在内。而且,在保存入声韵尾的方言中,把入声从其他调类中区别开来的主

① 应琳,“苗族中的汉语借词”,《中国语文》5(1962)。

②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56,北京。

要音征是韵尾,而不是基频。我曾用不同的音高、升调和降调发上海的入声字,只要后面带有一个喉塞韵尾,它们在上海人听来都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入声调。青田的入声带喉塞韵尾,并且是一个明显的降调^①,但是我用升调发给青田人听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我是发错了音。可见,入声声调的主要音征是音段特征,超音段特征倒是次要的。浙江的温州、青田、台州一带^②以及海南方言^③的上声都带有喉塞韵尾或者喉部的紧张,一些台语的声调亦有此现象^④。方言著作一般都是把这些喉塞或紧喉成分作为声调的部分特征加以描写的。所以,我们平时所说的声调,实际都已经包括了超音段特征和音段特征两种成分在内,跟韵尾的音段特征相似,声母的音段特征也应该包括在声调的内容之中。不过,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声调跟韵母联系在一起,而把声母撇在一边。但是事实上,声母的音段特征对于调类的辨别起着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主要的作用。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温州的阴平是 $\uparrow 44$,阳去是 $\downarrow 22$,两者都是平调,只不过高低有所不同。但是这种高低只是相对的不同,且不要说男女老幼之间的音高有差别,就是同一个人,可以把阳去发得比阴平高8度,但是听到的阴平还是阴平,阳去还是阳去。我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用十几个高低不同的音发温州话的阳去字“陷” $\text{fia} \downarrow$,最高音和最低音相差两个8度。录音以后除去开头带有声母的那部分音,剩下部分放出来都是阴平字“埃” $\text{a} \uparrow$ 。可见把温州话中的阴平字“埃”和阳去字“陷”区别开来的主要特征不是音高,而是声母的浊流成分。许多语言学家已经注意到声母辅

① 青田方言的材料来自我自己的田野调查。

② 郑张尚芳,“温州音系”,《中国语文》1(1964),又笔者自己也是温州人。台州方言的材料也根据郑张尚芳的田野调查(未发表)。

③ 梁猷刚,“海南方言中的喉塞音”,《中国语文》6(1964)。

④ D. Strecker. High falls more: A tonal sound change in Tai. CAAAL11 (1979).

音对声调的影响。D. Strecker 先生指出声母辅音跟韵尾辅音在声调中的作用是相等的^①。J. Brown 先生更明确地指出,杓状软骨(arytenoid cartilages)的位置与其说是属于辅音本身,还不如说是声调的组成成分^②。再从声调的历史发展角度考虑,把音段特征包括为声调的成分也更加符合历史的面貌。原始汉藏语好像没有超音段特征的对立,后来声调的超音段特征出现了,但音段特征在声调中还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古汉语的上声带有喉塞韵尾,去声带有-s(或-h)韵尾,入声带有-p、-t、-k 韵尾,这是很卓越的见解^③。后来去声和上声的韵尾逐渐掉落,声调中音段特征的成分逐渐减少,但是只要还有入声韵尾和全浊声母的存在,音段特征还是在声调范畴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只有到入声韵尾掉落,全浊声母清化,汉语的声调系统才完成了从音段特征向超音段特征转化的过程。从共时的平面看,把声母辅音的音段特征放入或不放入声调部分,是两种不同的音位处理方法。但是从历时研究着想,把声调概念扩大化,包括了声母辅音和韵尾辅音的音段特征在内,对于历史的描述既方便得多,也真实得多。由此,我们自然可以得到下面两条推论:

- 推论1. 带清声母的音节和带浊声母的音节不可能有相同的调形,所以 A 型合并只发生在全浊声母已经清化了的方言。
2. B 型合并只发生在舒声调内部或促声调内部,或者说舒声调跟促声调之间不可能发生 B 型合并。

① D. Strecker. High falls more: A tonal sound change in Tai. CAAAL11 (1979).

② D. Strecker. High falls more: A tonal sound change in Tai. CAAAL11 (1979).

③ Mei Tsu-lin. Tonal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 HJAS 30(1970).